

第十一章

我接觸過的幾位 風雲人物

第1節 提攜後進的周至柔

在我的軍旅生涯中，影響我最深的長官，首推周至柔將軍。

周至柔將軍人人尊稱為「至公」，1986年8月29日辭世，翌日的《中國時報》做了一個標題：「叱吒疆場創始空軍實『至』名歸，縱橫球場提倡圍棋非『公』莫屬。」這兩句話簡潔有力地勾勒了至公不凡的一生。

至公雖然被尊稱為「中國空軍之父」，但卻非空軍出身，他是保定軍校步科第八期畢業。1922年分發浙江第二師，擔任排連長，所以至公是從陸軍出身。

北伐誓師，他參加嚴立三師長統率的廿一師第六十三團，轉戰江西、浙江、江蘇各地，當時團長正是陳誠（辭公）先生。後來兩人一直保持良好友誼，因此很多人將至公歸類為陳辭公的人。但據我所知，他們在國防策略及處事方法上，意見不盡相同。

1927年，至公任國民革命軍廿一師上校團長，旋升任參謀長，繼續北伐作戰。1928年調任軍政廳長江上游辦事處少將主任。1930年，調卅三旅旅長，參加討伐閻馮之役；先後攻克馬牧集、歸德、蘭州、濟南及鄭州等戰略要地，以戰功升任第十四師副師長。翌年，晉任中將師長。

1933年國共戰爭，至公奉命馳赴贛南對抗共軍。因其雄才大略，謀勇兼備，故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旋調

升第十八軍副軍長。

該年是至公軍旅生涯的重要轉折點。他奉命出國考察各國航空事業，於1934年返國，並擬具建立我國空軍的計畫，以及設定航校的教育方針與辦法。這是我空軍最重要的一份文件，中華民國空軍於焉誕生（各地方空軍，也在這時統編入中央空軍體系）。

1934年，至公穿著便服，來到杭州梅東高橋草創時期的航校入伍生隊。當時我是入伍生，那是我第一次見到至公。不久政府便發布至公出任航校副校長，蔣公兼任校長。當時，因為大家都知道副校長不會飛行，不免有些輕視。記得有次上課，至公遲到，班上有位比較調皮搗蛋的同學葛正道舉手發問：「副校長為何遲到？」至公憋紅著臉說：「這不是你管的事！」後來葛正道沒飛出來，1935年被淘汰。至公一點也不記仇，鼓勵他赴美深造；葛正道轉換跑道，果然考上機械科留美，飛行夢也換成了異鄉情。

1935年，至公奉調出任航空委員會主任，進行建立空軍體制的全盤規劃。除了積極培育飛行訓練，並在南昌成立了龐大而現代化的空軍基地；又將航校畢業的各期飛行學生，編入新成立的飛行部隊，分授驅逐、轟炸等重要課程，和更進一步的專精訓練。

我與至公首次正式會面，應在1939年底的崑崙關之役的前夕。（詳見第四章）

我在崑崙關的表現以及赴美飛回「大西洋號」的勇氣，都讓至公刮目相看。1943年，至公找我去，交代我準備飛蔣委員長和夫人去貴陽，這項信任而重要的任務，也開啟了我爾後擔任總統座機長十年的契機。

1945年，至公以航委會主任兼任委員長侍從室主任，並住進了重慶棗子嵐埡空軍招待所。每回我到重慶，至公都親切地邀我下榻招待所。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觸到至公平凡的生活面。我發覺他一切為公，很少應酬，唯一的消遣是偶爾與陳良先生（人稱老公公）下下圍棋。

1945年8月14日，至公非常罕見地在空軍招待所舉辦了酒會，一則為慶祝八年抗戰勝利，一則紀念八一四空軍節。那天竟然來了千餘人，包括陳辭公（陳誠）和何敬公（何應欽），可見至公人緣之佳。

1946年初，航空委員會改組為空軍總司令部，至公出任首任總司令，肩負擘建空軍體制的重責大任，他全然而詳盡地規劃空軍「一面還都，一面建軍」的規章制度。整個中華民國的空軍，至此更進一步地全面組織系統化。

抗戰後期，我擔任空運隊隊長。當時空運隊擁有二十九架C-47飛機，但人手短缺。至公得知後，將剛在美國受訓完畢的官校十九期驅逐科學生，全部派到空運隊。不但使空運隊變成堅強的飛行部隊，而且十九期的學生，日後也成為發展民航事業的核心人物。

勝利還都，空運隊改組為空軍第十大隊，我出任大隊長，至公曾親來隊部嘉勉打氣。

當時我大隊預定分駐南京、北平及上海各地，為此我到重慶空軍總部，請求核發各辦公處所的開辦費。當時劉國運參謀長和我正在至公辦公室，正好有一份電報送到，那是王副總司令為在北平設立指揮部請發八百萬元開辦費。至公很氣憤地說：「要錢可向委員長去要，空軍總部沒錢！」後經劉參謀長說項，至公才批准所請之八百萬元；而批給我的則是照我所請的兩千萬元。由此一事，可見至公對空運部隊之重視；但也引起一些人的嫉視，說是總司令袒護空運隊。

我生平曾與至公衝突過一次。當時空運隊員出任務時，趁著職務之便，常順道帶些香菸等物品。於是有人就一狀告上去，指責空運隊走私。為此，我特別晉見總司令，建議在主要基地成立檢查小組，以防私運物品。我身為部隊長，理應負圓滿達成任務之責；而對飛機攜帶私品，以國土之大，我個人實在無力杜絕可能之非法行為。

空總接受了我的建議，成立了檢查小組。我也將此事向全大隊宣布，希望大家不要亂帶東西，以免觸法受罰；我也特別說明成立檢查小組是我的建議，目的在保護好隊員，並維繫我隊清譽。小組成立後，飛機離、到，均經嚴格檢查，甚少違法之事，我自覺很滿意。

有一天，特將此情回報至公。但我尚未開口，至公

就火起來，使我莫名其妙。我心有不甘，又值年輕氣盛，隨即脫口而出：「總司令，我向來尊敬你，因你有接納部下意見的雅量。而今你尚未聽我報告，即行發火，我無法接受。我不幹啦！」說完掉頭就走，回去告訴家人：打鋪蓋，頂多坐牢、槍斃！

後來，參謀長劉國運打電話來問：這到底怎麼一回事？他說總司令一直在辦公室走來走去，自言自語說：「不該遷怒衣復恩，你去找他解釋一下。」因此劉參謀長打電話給我，再三要我去新生社吃飯。

我去之後，他說：在我進總司令辦公室時，他剛收到一封電報，告某單位的狀；總司令未看清楚，誤認為是空運隊，所以沒等我開口就發起火來。後來發現有誤，叫我找你說明。

既是如此，我當然也就不走了。由此可見至公對部屬之寬厚及勇於認錯之氣度。

1950年3月，蔣公復行視事，至公升任參謀總長仍兼空軍總司令。1954年總長任滿，改調總統府國防會議秘書長（副秘書長為蔣經國）。一直到1957年8月，奉調台灣省省主席，才離開軍職。這一段期間，至公對我一直鼓勵有加，愛護備至，絕未因我的牛脾氣，而在心中存有任何芥蒂。前文曾經提及，很多人將至公歸類是陳辭公的人，其實在他心中只有國家，而無派系之別。

政府遷台後，他與老總統有時理念不合，又不敢當面明說，只好背後發發牢騷。他常說：「反共已困難

了，還要抗俄！」

省主席任滿後，1962年12月，至公奉召回役，擔任總統府參軍長。後來蔣公派他出任駐泰國大使，至公拒絕，他說：「我是軍人，不會搞外交，恐怕延誤領袖之付託。」蔣公聞後頗為不悅。於是在1967年3月調任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國家建設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國安會的秘書長是蔣經國。從此至公正式揮別軍旅，卸下公職，專心提倡圍棋和高爾夫球運動。

他從絢爛歸於平淡，卻以一介平民，從事公益活動，再創人生的高峰。體壇和圍棋界，提起至公，沒有人不感佩的。

我追隨至公多年，深刻體認到他有一些傑出的人格特質。首先，他是一個自我要求十分嚴格的人，他的英文原本不佳，可是他訓練自己，下功夫苦讀，到後來能說能讀。

其次，他非常喜歡讀書，涉獵層面極為廣泛：從古典文學的經史子集，到後來常看的英文《時代》雜誌和《新聞周刊》，兼容並蓄，學貫中西，堪稱一代儒將。

第三，他為人謙沖坦誠，從不爭名，與毛邦初將軍輪替做空軍首長，上台與下台，毫無得意或慍色。對人對事，坦誠以待，是非分明，不耍心機。

至公家中一直掛一幅張篤倫（曾任西康省主席）寫的甲骨文對聯：

「先齊其家，萬物並育；如保赤子，四方歸之。」這四句話正是他敦厚可親的寫照。

很多人都說我是周至柔的人，外界也有人說周至公太祖護我。事實上，我跟至公一樣，不是誰的人馬，只是一個效忠國家的忠誠軍人而已。我視至公為恩師，因為他對我有知遇之恩，給我很多鼓勵，更願意給我做事的機會。我當然盡心盡力，戮力從事，以報答這份恩情。

我年歲漸長，比較喜歡讀書。有時翻閱《貞觀政要》，對唐太宗李世民之統御能力，相當佩服。也深自體悟到，為首者須謹慎行事，嚴以律己，要知人、容人、納諫、精明、寬厚。而周至柔將軍對我而言，正是這樣的一個人，也是影響我軍旅生涯最深的一位長官。

在結束本文前，我要一提至公對台灣高爾夫球運動的貢獻。他在1967年，國家安全會議主任委員任內，因事情不多，就擔任中華高爾夫協會會長。關於他與我國高爾夫球運動的淵源，略述如下：

1950年代初期，高爾夫運動在台灣尚不普遍，僅有淡水球場；且球場中多處在二次大戰期間，為防美軍傘兵來襲，日軍建了很多處碉堡。戰爭結束後，聽說只有七個洞可用。1949年國府遷來台灣，1954年，中美訂立聯防協定，大批美軍顧問來台灣，淡水球場才活躍起來。該球場的管理也由美軍顧問團負責，並從桿弟中培育出不少專業球師，其中已有幾位揚名國際。

1953年間，當時的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為提倡高爾夫球運動，於是把台北水源地的老飛機場改建為九個洞的球場，並成立台北高爾夫俱樂部，廣徵會員，但參加的人很少。記得成立之初，永久會員的會費是八百元。我曾把好友、當時復興航空的總經理陳文寬拉進做永久會員；但是直到今天，他從未打過高爾夫，他的球證在台北高爾夫俱樂部改組時，也就被認為無效。之後，又成立台灣高爾夫理事會，由周將軍任理事長，他勸進了一些人出任理事，並大力提倡高球運動。同時也培育了一些高球選手，如謝永郁、呂良煥、謝敏男、郭吉雄、陳志平、志忠兄弟等，為國家爭取了不少榮譽。

高球運動隨著經濟的成長而逐漸普遍。但是當時有不少人反對，認為高球是貴族的遊戲，費錢費時，又須有汽車為交通工具。我曾為文反駁此論，並引述當年英國為高球事，曾在議院惹起一場爭論，結果還是反對者失敗。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如今英國已成高球的搖籃。且高球風行全球，特別是在一些富裕的國家，更為一般人所愛好。

高球運動老少咸宜，其運動量更合乎中、老年人。有人說高球是一種迷人的運動，一旦接觸，很少半途而廢的；打球者會發瘋地緊追那粒小白球，把一切煩惱都置於腦後。為追趕小白球也就自然得到運動，且呼吸了新鮮空氣。論費用，應該為一般中上收入者所能負擔。台灣由於經濟進步，國民所得逐年提升，因此打高球的人也由當年的百餘人，增加到今天的數十萬人，甚至近

百萬人。這代表社會的進步，也可說高球是一個進步社會的產品。

我們的選手，曾多次在國際大賽中贏得冠軍，為國家帶來很多榮譽。記得澳洲「國寶」、曾五次獲得英國公開賽冠軍的彼得·湯卜森先生，在參加1978年台灣公開賽時，曾在大會中鄭重說明，他此次來台參加比賽，主要目的是要告訴大家：台灣的高球選手在世界比賽中表現優異，使很多人不但知道台灣的存在，更認知台灣必然是個有水準的社會。

另有一次，我駐巴拿馬大使黃仁霖先生，力邀我國派代表參加在該國舉辦的加勒比海巡迴賽，郭吉雄在百忙中抽身前往，一舉獲得冠軍。巴國政要都前往我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媒體並以頭版大幅刊登此項消息。黃仁霖大使表示，在他呈遞到任國書時，報上只登了數行小字；而大使館國慶酒會，也只有很少的當地政府高級長官到賀；然而郭吉雄拿到冠軍，給我大使館帶來無限殊榮。

以上略舉一二，其他光榮的事蹟還很多。總之，那一代的球手，無往不利；特別是在亞洲的高球賽，可說是我台灣選手的天下。我們的選手爭氣，而社會大眾也熱心支持，才有那麼多年豐碩的成果。而今江河日下，也許是我們的經濟「起飛」了，百姓的生活富裕了！但過去的刻苦耐勞的精神卻失去了，高球的選手也因此而漸無可誇讚的表現。這值得我們警惕，人不可因物質條

件好，而降低鬥志。歐美日諸先進國家的經濟，不是比我們好得多嗎？他們還是培育出很多優秀的體育人才。特別是鄰國日本，當年在高球場上很少有他們的份兒，但現今我們反而跟在他們後面，勉強沾了他們一點雨露。前後不過三十餘年，物換星移，令人感慨！但願國人以此為戒：不可稍有成就，即因驕傲而漸怠惰，貽笑世人。

我國高球的發達，歸功於當年周至柔將軍的提倡。我自1960年代，即為中華全國高爾夫委員會委員，親自目睹了高爾夫運動的發展，為表彰周將軍對台灣高爾夫運動的貢獻，同時表達我們的敬仰之意，我發起一項「至公杯高爾夫邀請賽」，獲得各界的響應，並恭請宋長志將軍擔任比賽委員會主任委員。經月餘的籌備，於1983年10月11及12日，在台北高爾夫鄉村俱樂部舉行第一屆比賽。應邀參加的除熱愛高球運動的各界人士外，主要是邀請這些年來由至公培植的職業球手，如謝永郁、呂良煥等數十人，以報周公知遇之恩。那時在軍政界打球的風氣尚未盛行，但參加的人還是不少，如彭孟緝、劉安祺、黎玉璽、馬紀壯、郝柏村、高魁元、鄭為元等將軍，文人方面有蔣彥士、閻振興、許金德，以及當年還是新生代的錢復、宋楚瑜等數十位。群星雲集，充分表現大家對周至公的擁戴。1986年8月29日至公過世，從此高球失去有力的推手。近年雖已較以前普遍，但職業選手的成績，每下愈況，國際比賽中不但不見排名，甚至不被邀請。今非昔比，不禁想到周先生對高球

發展的貢獻，故略加敘述，以表示我個人及好友們對至公的懷念。

第2節 樂天知命的張學良

「復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亦必復活。」

夏威夷一處墓園的大理石上，刻著〈約翰福音〉十一章二十節經文。墓園的主人，雖然仍然快樂無憂地活著，但是自己預先準備的碑文，充分流露出凡事信靠上帝，往事拋諸前塵，但求克己的出世觀。

1901年出生的張學良，公元2000年正好過百歲大壽。

少帥夫婦遷居夏威夷後，我們每去該島，都赴張寓聆聽教誨，或陪少帥打場小麻將；如遇過年時節，則推兩場牌九，非常熟絡。他夫婦始終對我和瑛華甚為關愛，我對他們則是既欽佩又敬仰。

以我的認知，張漢公最令我欽佩的是他大公無私的胸襟。他很少有隱私，對過往的許多所謂「糗事」，毫無隱瞞；待人對事，十分誠懇。少帥常說一句話：「就算明天槍斃，晚上照樣大睡！」這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同時也顯現出他做事但求無愧於心的風格。

他每天睡覺時間相當長，晚上八點三十分睡到隔天早上十點起床；下午又從一點半睡到五點。而且一躺

下就呼呼大睡。不像一般人心中如果有事，就會輾轉難眠，漢公完全沒有這種困擾。他說：「心中坦蕩蕩，一覺到天明。」

我個人也常想：一個領導者不可有太多的「隱私」，應該要非常透明。你領導大家，大家當然對你關切；因你的所行所為，關係到大家的前途和幸福。你隱私太多，大家就猜不透你在想什麼，又如何能真心擁戴你？漢公直到今天，還為眾多國人所懷念，我想主要還是由於他的忠誠愛國，而且守住了一個「義」字。我個人很佩服他的政治主張，當然有些事還須待歷史來評斷；我也相信有些事，漢公在他口述回憶錄中，當會有所交代。

另外，他與夫人均是很虔誠的基督徒，他們兩老在晚年由信主中，得到很大的安慰。張夫人每日必讀聖經給少帥聽，他們也在檀香山基督教會做見證。張夫人趙毅荻（本名一荻）女士曾以「多加」的筆名，著有傳道集四小冊，分送親友。

1997年春節，我和瑛華去檀香山看他們，共進晚餐數次。漢公以九十七歲高齡，精神仍十分飽滿，與大家談笑風生；興起時，還會唱一段奉天大鼓或武家坡等京戲。雖然有點重聽，但頭腦還是十分清楚，不像一般老人家。少帥夫婦已為身後事做好準備，在檀香山近郊一處氣勢雄偉的土地，為自己訂下一塊塋地，作為將來的「官邸」（趙女士語）。以漢公體質看，活過百歲毫無

問題；而毅荻夫人「為少帥而活」的心志，也應會與少帥偕老。

奇怪的是，有一天在一起聊天，漢公突然把小帽摘下，給我們看他頭上最近竟長出一些短短黑髮來，大夥嘖嘖稱奇。漢公指著頭頂幽默地說：「蒙不白之冤。」真是一位樂天知命的長者。

1998年春節，我和瑛華再去拜訪漢公，發覺趙四小姐的身體日差，尤其是肺不好，健康狀況不如少帥，但她靠著堅強的意志力支撐著。回顧西安事變後的六十四載歲月，少帥固然有知己、高談轉清，有神交、印心證道，愛讀書、究明史，蒔花草、觀山水的怡然雅趣，但是趙四小姐的笑語解人，深情依偎，我想才是少帥半生沉潛的重要精神支柱。而趙四小姐此生彷彿只為少帥而生，為少帥而活，生命燃燒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照顧和陪伴少帥。

記得有一回，趙四小姐在證道時說：「為什麼才肯捨己？只有為了愛，才肯捨己。世人為了愛自己的國家和為他們所愛的人，才肯捨去他們的性命。」她的證道詞，說的正是她自己。

1999年春節，我們再次造訪。大家久別重逢，倍覺興奮。少帥的聽力和視力似乎更差了，我與瑛華心中不免有些擔憂。但看到漢公又打麻將，又推牌九，絲毫不以為憂。想必歷史恩怨與個人生死，在漢公心裡早已雲淡風輕，沒有什麼榮辱值得計較，心境自然一片平和。

我第一次見到漢公，是在西安事變時。1936年，我們空軍第九中隊奉命派到洛陽駐紮。聖誕節前夕，大家正在機場待命，忽聞傳說：「蔣委員長脫險，即將在洛陽降落。」不多時，即見一架客機落地加油，一位身著上將軍服的軍官緩步走下飛機，他就是張學良。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他，僅只是驚鴻一瞥而已。

次年夏天，空軍第九中隊去安徽黃山遊覽，頭一天住在山麓下的一處招待所。那時黃山很僻靜清幽，除了這家招待所外，別無任何建築。傍晚時分，我們幾個人去附近的溫泉泡澡，那是一處有名的「珠砂溫泉」，泉水清澈而無硫磺味。出人意料地，竟在那裡碰見張學良，也在同一池中泡澡，並且親切地向我們打招呼。我們那時少不更事，除了曾道聽塗說一些有關他的傳聞外，就知道他在西安「挾持」過領袖，其他倒也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

次晨，我們信步走上蜿蜒的山路，來到佛教勝地文殊院。在那裡巧遇國畫大師張大千，當時他正要勾畫「松鼠跳天都（山峰）」；攝影家郎靜山也在一旁取景。沒想到，我們這群年輕人很不識趣地在山中放槍作樂，打擾了他們創作的靈感。結果被張大千罵了一頓：「莫名其妙！」當時，張大千畫了一隻老虎，一位同學指著說，這隻貓倒畫得不錯。頓時讓大師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大陸淪陷前夕，劉大年同學負責將張學良從重慶飛

抵新竹。他與趙四小姐在新竹住了些時日，就移居台北近郊北投。

1956年，有一天空軍前輩王衛民將軍，在他府上請我夫婦吃酸菜火鍋。正當大夥大快朵頤時，突然來了一通電話，是蔣經國邀我們去北投吃飯，我和瑛華只好先行告罪離席，轉赴邀約之地。

那是安全局在北投的一處招待所。我們進去後，只見在座除了蔣經國、董顯光之外，還有張學良和趙四小姐，以及一對負責「陪伴」少帥的劉姓夫婦。我與瑛華連忙入席，加入「乾杯行列」。沒等到酒席終了，少帥及趙四小姐雙雙醉倒，其他人也已不太清醒。蔣經國的「勸酒」本領實在高明。席罷，我們夫婦倆自行駕車返家，我開到一半即覺頭暈眼花，實在開不下去，只好請瑛華代為駕駛，開回我們新生南路的家。

自此之後，蔣經國每次邀宴少帥，就常常找我夫婦作陪。有時在我家後院吃擔擔麵，蔣經國也會電請少帥參加。我因此對他有了比較深入的接觸。

趙四小姐對蔣經國一家，禮數備至，每週必親自做些小點心送至蔣府。在我的感覺，蔣經國對他們的反應，似沒有同等的熱情。

少帥在北投自費建造了一所樓房，當他倆遷入新居時，曾邀我們參加晚宴。事後蔣經國向我夫妻表示，此時此地不宜太過張揚，他這麼做恐會「影響」他的自身安全；因為有很多經歷過西安蒙難的家屬遺族都在台

灣，可能會採取報復行動等。蔣經國並透露：張家喬遷之日，正好是蔣孝先在西安被殺的忌辰。後來聽說蔣夫人建議由經國負責張的安全，我對此決定，嘆為高招。

有一天，在台北市四條通蔣宅，蔣經國向我出示一本小冊子，原來那是張學良親筆寫的「回憶」，他歷述西安事變的起因和經過。在我印象中，少帥在文中並無「悔過」之意，且強調事變起因之一，是蔣委員長在臨潼召開軍事會議，而未召當時該區最高軍事首長張學良參加。

在回憶錄中，張自承西安事變「舉措不當」，但絕非「叛變」。文字中對蔣委員長也沒有任何不敬，語氣不卑不亢，敘事據理說明。

張學良寫完這份「西安事變反省錄」，就交給蔣經國。後來被軍方的《希望》雜誌刊出第一章，曾引起軒然大波，不僅導致雜誌停刊，也有將領因而去職。但是我相信這些珍貴的歷史性文件，終會有公諸於世的一天；後來少帥也接受了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的訪問，歷史的真相終會大白。少帥沉潛半生，虔誠事主，心中只有愛，而沒有恨。他絕不會要求平反；因為是非對錯，毀譽褒貶，他心中早有定見了。

張作霖一生總共生了學良、學銘、學曾、學思、學森、學浚、學英、學銓等八個兒子。其中老五學森曾在空軍服役，後來在夏威夷華航辦事處工作，他與少帥是同父異母。

中共一直希望少帥返鄉，但張學良早已無此意願，而由弟弟學森代表回東北老家，受到中共方面極盛大的歡迎。但是學森在一次北京的飯局中，突然心臟病發作死亡；中共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喪禮，骨灰送回夏威夷。

記得1990年，少帥九十歲生日那天，首度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公開宴客亮相，少帥將我列為壽宴發起人之一。那天湧來近百位媒體記者，閃光燈亮個不停，我在一旁看著台上的少帥顧盼從容，所謂「白髮催人老，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雲」，不正是少帥九十大壽的心情寫照嗎？

有一陣子，小女淑凡也與少帥走得很近，因為淑凡在蘇富比藝術經紀公司工作，與少帥同有愛好書畫之癖，所以常有來往。

少帥後半生最重要的關鍵轉折，在於信奉了基督教。1995年11月19日感恩節禮拜，少帥在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公理會做了一次證道，說明他信基督教的經過。那篇證道詞充分顯現他後半生的情緒轉折和心境，是後人研究或了解少帥不可不讀的一份重要文件。他的證道詞如下：「很多人都想要知道，我怎麼會信基督教？我現在就把我信基督教的經過講一講。我想上帝既然賜給我這麼長的壽命，就是要我為他做見證、傳福音，引領人來信上帝和耶穌基督而得救。

我年輕的時候，在奉天常到基督教青年會去打球，在那裡認識了不少的基督徒。有時候我到那裡去

聽演講。我很敬仰南開學校的校長張伯苓先生和上海青年會的總幹事余日章先生；尤其是那時候奉天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美國人普萊特先生，他很愛護我，並且願意給我安排到美國去讀書。他們都給了我很深刻的影響。無形中，我也對基督教有了好感。後來因為我進奉天講武堂，畢業後到軍隊裡去做事，就很少跟基督教的人來往。

以後，我從浙江、江西、湖南到貴州，在這一段時間裡，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灣後，我感覺到需要有一個信仰。那時候情報局派到我們那裡負責的人是佛教徒。他就同我談佛教，也為我安排去見在新竹的幾位佛教法師。我同他們談了幾次，也買了許多佛教的書來研究，一直到我們搬到高雄要塞。有一天，蔣夫人來訪，她問我近來看些什麼書？我告訴她我正在研究佛學。她就說：「漢卿！你又走錯了路。你也許認為我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國許多有名的、偉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難道他們都是愚蠢的人嗎？」她說她希望我也研究研究基督教。我就告訴她，我很希望讀點英文。她就請剛從美國卸任回來的董顯光大使來幫助我。

他們來了之後，就常到我們那裡來。董顯光的夫人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她來了就同我們談基督教。他們送給我一本《馬丁路德傳》，我看了很感動。以後我和董先生就拿蔣夫人送給我的一本基督教的英文書《相逢在髑髏地》（*They Met At Calvary*）作為課本，我就把這本書譯為中文。

我們搬回台北不久，董先生夫婦就到美國去了。蔣夫人便派人來陪我到士林凱歌堂做禮拜、聽道。我在那裡認識了周聯華牧師，以後他就來幫忙我讀聖經和研究神學。因為中譯本的神學書不合用，周牧師就建議申請美南浸信會的神學函授課程。從此我就研究神學，一共讀了十幾年，才拿到畢業證書。因為我的英文不好，每次寄來的功課，必須由周牧師譯為中文，錄在錄音帶上。我聽了之後，用中文回答問題，然後再由周牧師譯為英文，寄回神學院去。有一段時間，周牧師出國，我就自己用字典慢慢地讀。所以用了這麼長的時間。

感謝主！在我讀聖經的時候，上帝的光，照到了我心裡，使我明白祂的旨意和聖經裡的話。祂的大能改變了我。祂的愛，使我知道祂是愛我、為我捨命。使我因信耶穌基督而得救。我在1964年受洗。

上帝給我所安排的，實在是非常奇妙。祂先使我跟基督徒接觸，又叫祂的僕人和使女來帶領我，又再給我安靜的環境和很長的時間去研究神學，然後給我安排到夏威夷來。

我從來也沒有想到夏威夷來。來了之後，不久就被我們的親友帶到基督教公理會來做禮拜，聽嘉禾牧師講道。在1994年1月21日我在教堂做見證。以下就是我的見證：

『各位弟兄姐妹：

我張學良雖然已經九十四歲，感謝主，我還沒有

糊塗。今天看到諸位真是非常高興。我年輕的時候在軍隊裡，可以說什麼事都做。在內戰的時候，我參加了許多戰役。像我這樣的人，怎麼能做基督徒，實在是主的恩典。

我們要做基督徒，很簡單，只要心裡真正的相信，口裡承認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我現在無論大事小事，隨時禱告。應該做的求主領導；不應該做的求主攔阻。我曾是一個放蕩的人，現在我把自己交給耶穌基督。一切事情歸榮耀於主。

大家對我有種種的說法：有人說我好，我也不見得有那麼好；說我壞，我也沒有那麼壞。上帝祂知道：我這個出身行伍，在軍隊裡混的人，今天能成為一個基督徒，不是靠自己，完全是主的恩典。主實在是恩待我，把我從罪中拯救出來。我現在很自由，無論什麼都無所畏懼。我希望諸位都能信主。但是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是要從內心裡，不是在口頭上；也不是在外表上，而是要真正的信上帝和耶穌基督是你的救主，把自己投入主的懷抱中。謝謝各位。』

我真是感謝主：在我這一生中，祂引領我、磨鍊我、教導我，把我從罪中拯救出來，成為一個基督徒。使我能成為祂有用的僕人，能為祂工作。我現在所有的喜樂平安，都是上帝賜給我的恩典。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裡，我要存著一個感恩的心，來為祂做見證，傳福音。

最後請大家看兩段聖經：

1.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十節）。
2.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賜的（〈以弗所書〉二章八節）。
（1995年11月19日之感恩節禮拜，於夏威夷第一華人基督教公理會）

第3節 神秘莫測的戴笠

1944年冬，蔣緯國與西北企業家石鳳翔的次女石靜宜小姐結婚，蔣委員長特派經國先生前往西安代為主持婚禮，當時我也應邀觀禮。婚禮在王曲陸軍官校七分校舉行。

在那次冠蓋雲集的場面上，我正式見到了軍統局局長戴笠（雨農）。雖然我早已耳聞戴先生大名，但從未晤面。他對我則有些認識，原因是當我還在擔任「大達機」駕駛員時，有一次出差到重慶珊瑚壩機場，與中航的陳文寬機師，約定同駕該機飛廣陽壩。不料他竟然在約定時間前獨自駕機起飛。那時我已經到了機場，眼看飛機離地，我非常光火，不禁掏出手槍，對著他那架剛升空的DC-2連開數槍。

誰料蔣委員長侍從室的德籍顧問史坦納司當時正在機場，看到我這個粗暴舉動，就寫了封檢舉信給蔣夫人，而蔣夫人則將該信轉交給戴笠查辦。對於此事，我

始終一無所知。直到在西安見面時，戴笠才向我出示那封英文信。當時我很感激他沒有追究我一時的失態舉動，也佩服他的細心和用心。

在西安的數日中，每天都在一起餐飲。他酒量很大，性格豪爽，給我很深的印象，也建立了一點感情。但由於我在公務方面和軍統局並無任何牽連，所以那次相聚後，我們鮮有往來，而他也幾乎不曾使用過空軍的飛機。其中唯一的例外，是有一次我方在上海的諜報組織被日方破獲，戴笠親自率員深入敵後（據聞是上海郊外），重整布局。事後，我們派了一架C-47，將他們從贛州接返重慶，降落在九龍坡。當時我剛好在那裡，看見一群便衣打扮的人從飛機下來，戴笠即在其中。若非經介紹，絕不會看出他就是堂堂有名的軍統局長。

抗戰勝利之後，由於職務所需，我常前往北平，視察駐防在當地的兩個中隊。那時的軍統局，在當地也設有分支單位，我和戴笠常常不期而遇。有時，我去當時東北吳省長的兒子吳幼泉的家中作客，也會碰見戴，因此兩人逐漸熟稔起來。吳幼泉還曾把一對鍍金手槍，分送給戴和我紀念珍藏。我的那一支槍，在來台灣後，已捐贈給國軍歷史博物館收藏。

戴的精力超人，他的隨從曾告訴我說：戴每日工作負荷甚重，而睡覺時間僅三小時左右而已。情治工作，重在單線聯絡，所以他每到一處，必親自對屬下有所詢問及交代。勞神費心，自屬難免。

在北平期間，戴笠曾向我透露一些軍統局的事，以及在抗戰時與美方代表海軍少將邁爾斯（Rear Adm. Miles）的合作經過。戴在那時，由美國海軍陸戰隊指派C-46飛機兩架供他使用。但有一次，他忽然請我派機送他去天津，而我也剛好要去那裡，探望已故老友楊天雄的雙親。在途中他向我表示，不想再從事軍統局的工作，打算前往美國考察。他甚至說已計劃妥當，並備好一筆費用，託駐美武官蕭勃（信如）代為打點其他細節。

至於戴笠為何突然有倦勤之意？他告訴我兩個原因：

其一是戰後軍統局大肆搜捕曾經為虎作倀的漢奸嫌犯，有部分雖已得到國法的制裁，但是有許多人卻利用各種關係管道，開脫罪名。許多政府要員，竟然也不顧是非地橫加干涉，阻礙了調查工作及審判的公正。戴笠還特別舉出孫科為其女友藍妮關說為例，使他尤為忿忿不平。

另一個使戴笠感到力不從心的事，則是軍統局在東北地區的布建工作甚為薄弱，無法提供給蔣委員長足夠掌握的敵情，使得國民政府在東北的勢力，一直無法穩定；與共軍的戰事也連連失利，更加深了他的挫折感。

1946年3月17日，濃密的雲層籠罩了整個南京上空，我在明故宮突然接獲電報，謂戴笠搭乘本大隊的C-47正從青島飛來，因此我特別登上塔台守候。在這段

時間內，有八、九架空運機陸續進場降落，但偏偏不見那架編號「222」的飛機。等到超過預定抵達時間一小時後，我察覺有異，轉而詢問附近機場，也未獲任何消息，於是立即發電報向北平查詢該機的駕駛員為何人。

很快的，北平方面傳回了「馮俊忠」三字。看到這個名字，我頓時心中涼了半截！因為我對其飛行技術向來就不太有信心。

馮俊忠來自廣東空軍，早先在成都時期負責駕駛小比機；在換裝C-47時由我親自考核，而未能放他單飛。後來他被調往一〇三中隊，我還特別交代周伯源隊長對他的考核要格外注意，千萬不可輕放單飛。過了不久，周伯源告訴我：馮已及格，並予單飛。我雖為馮慶幸，但心中疑慮並未全消。因為飛行的事很奇怪，能飛與不能飛，飛得好或飛不好，一個有經驗的教官對所帶飛的人，很容易察覺得到。飛行是需要點天才的；呆板的訓練，不會造就出高超的飛行員。

第二天，終於有報告說：在南京的東南方一個山丘上，發現飛機殘骸。我立刻派人驅車趕往處理，並自己親駕飛機飛往現場。從空中，我可以清楚看見那架C-47墜毀在山頂上，而山腰中則排列著罹難者的屍首，已不可能有人生還。

由於戴笠身分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因此我親自趕往北平，追查失事的原因。楊副大隊長向我報告：前一天他接到王叔銘副總司令的電話，謂：「有重要任務，派

一個老飛行員！」由於王副總向來嚴厲，楊副大隊長未敢進一步請示，即針對這兩句話做出調遣；但又未能了解長官所謂「老飛行員」之意，而將那些年輕而優秀的飛行員排除在外，真的奉命去找年紀最老的馮俊忠來出任務。

我根據失事現場的位置研判；該架C-47在進行第二次穿雲下降時操縱不當，未遵守「通過電台上方時，應將空速控制在120哩／時以下，下降速度應在500呎／分」之規定，在超速的情形下，當它在預計轉回機場方向前，就已經衝過了頭而撞山失事！我認為這是飛行員的過失。

戴笠因為統領全國的情報任務，向來神龍見首不見尾，因此外界有許多穿鑿附會的傳說。我有幸與其相識，他卻因搭我大隊飛機而身亡，這是我一直感到非常遺憾的一件事。

戴笠給我的印象是神祕、冷靜、機智，馭下及克己皆很嚴格。他在情治上的卓越貢獻，素為當局所倚重；甚至有人認為當年在大陸之失利，與戴笠之早逝亦有關係。此說是否正確，見仁見智，難下斷語。依我個人的看法，情報固然重要，但大陸之失守，與戴笠之死，關係不大。

第4節 長於口才的周恩來

1944年的某一天，我奉命送中共代表周恩來由重慶飛回延安，機上同時攜有國民政府補給八路軍（共軍）的軍餉數包，據告知是法幣三十萬元。那時的延安，完全暴露在日軍空中攻擊的威脅之下，既無預警裝置，也無通信設備；我只能憑目視低空飛行，避日本人的耳目。

當天下午飛抵延安上空時，往下看去，只見一處大操場，還有很多正在出操的士兵。他們見到漆有青天白日國徽的飛機臨空，立即迅速散開，我也就順利降落，停在操場邊上。那些共軍士兵面對我機列一長隊，當時在場的一名指揮人員，身材矮小，除了迎接周恩來下機外，並喚來兩個士兵，交代把機上的幾包鈔票揹起，跑步送往某處。我當時的感覺是共軍頗有紀律，而且對屬下很信賴，否則不會隨意叫幾個士兵就把很多現鈔拿走。不過，我後來才了解，在延安那種地方，即使拿了現鈔也無處可用。

我們機員由一位年輕人陪同，乘坐當地唯一一部漆有紅十字的旅行車，到一處窯洞歇息。途中他告訴我們，在機場指揮進出、那位身材矮小的「同志」就是鄧小平；還說他們八路軍的待遇很公平，每人一律每月法幣一元，連毛澤東也不例外。

當日下午無事，我們被招待「遊覽」延安，探訪毛澤東以前的住處。因為日軍不斷轟炸，他們的領導人物

包括毛澤東，都搬到窯洞居住。

晚飯時，共產黨招待我們吃炸雞塊、蕃茄、麵包等西式餐點，倒是十分考究。飯後，林彪來看我們，他那時是延安「抗日大學」的校長，剛由俄國療傷回來。他向我們炫耀他從蘇聯帶回的兩樣「寶貝」：一個是手動電筒，不用電池就能發光；另一樣則是野外鵝絨被筒（即今天俗稱的睡袋），這兩樣東西在戰地都很有用處。當時的林彪，穿著雖與一般士兵沒什麼兩樣，但卻精神抖擻，說話快而不善辭令。看過我們之後，即匆匆離去。

當夜，我們就睡在窯洞裡。次晨天尚未亮，即向機場出發。途中經過一處窯洞，停了下來，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朱德等五、六人自洞門出來。毛身著棉軍服，周恩來為我介紹，我們兩人還握了手。當時我看他們個個面帶倦容，想必是開了一夜的會。朱德搭同車去機場為我們送行，他穿著一件超大號的皮革短大衣，看似一位平凡的老農，與士兵談笑風生，毫無「紅軍總司令」的架勢。另外我還看見丁玲和藍蘋（江青）等人，遠遠站在機場附近一個小山坡上，看我們的飛機離去。

返航時與我們同機的，還有約二十位派往重慶工作，剛從「抗日大學」畢業的男女學生。飛機起飛後，本定飛返重慶，但周恩來到駕駛艙，問我可否改飛蘭州？我說要問問天氣才能決定，經由通信員詢問結果，當地天氣良好，於是我就依其請求，改飛蘭州。

下機後，周恩來指令隨機前來的二十幾位青年男女在機場待命，並說他要去蘇聯領事館辦點事，語氣很自然。

他邀我們機組人員在蘭州最大的飯館「陶樂春」吃晚飯。那時周恩來是「八路軍」駐重慶代表，留西髮、著深藍色風衣，十分健談，絲毫不像我們在其他照片上所看到一頭短髮，滿臉長鬚，身著棉軍衣，騎著一匹小馬的「土八路」樣子。

周恩來的酒量很大，而且能言善道，頗像一位年輕的大學教授。他在席間所談的，除了在重慶的那些國民黨老朋友的趣事外，最主要的就是品酒。周恩來說，世上最好的烈酒是茅台，它比俄國伏特加（Vodka）好。他們紅軍「長征」時，路經貴州，曾喝過不少茅台。又說汾酒也不錯，但是他們紅軍在汾陽喝完酒後，就把當地釀酒的設備全部搗毀了，所以現在的汾酒已經不行了。講到外國酒，則認為法國的香檳最好。當晚大夥喝得酒酣耳熱，相談甚歡，賓主盡興。

次晨，我們由蘭州飛返重慶，臨別時，周恩來還送了我一件延安製的黑皮短大衣。

兩天的延安行，讓我有機會見到共黨的幾位領導人物。由於延安物質環境貧乏，毛澤東、朱德、林彪、鄧小平都給人一種「土八路」的印象。唯獨周恩來，我們兩度同機，一晚歡談，他給人一種比較有文化的感覺；而且親和力十足，言談風趣，又充滿機鋒，因而我對他

的印象改變了很多。往後多年，事實證明他確實是一個人才，在共黨中的風評極佳，他死後仍為很多中國人民懷念；而他在國際上的表現，也令世人稱道。

不過，周恩來治軍嚴謹，也有他冷酷的一面。在我們抵達蘭州後，二十多個大學生在炎熱的天氣下，擠在飛機機翼下面，酷熱難當。我建議周恩來：「拿點西瓜給他們吃。」周恩來搖搖頭拒絕，說：「不必啦，等會有人會來照顧他們。」我當時感覺他對那些年輕人不夠仁慈。但這只是我的感覺，不應對周做定論。

第5節 常勝將軍傅作義

我每次讀到謝枋得的一首詩：「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鐵硬對皇天；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心中就想起抗戰的歲月，感慨萬千。

我有幸參與中國空軍的戰鬥行列，雖然當時設備簡陋，飛機老舊，但是人人熱血奔騰，出任務奮不顧身，未見貪生怕死之輩，只有身先士卒之軍。我們那時真是一群「不知死活」的狂熱小伙子，真的是對國家有著「萬古綱常擔上肩，脊梁鐵硬對皇天」的勇氣與抱負。這種使命感讓人感到很過癮，也替年輕的歲月，留下美好的回憶。

但是戰爭也讓人性的「芳穢」皆露，「榮枯」並顯，歷史自會有公評。而傅作義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傅作義因在晉奉大戰時死守涿州，而一舉成名，為西北軍名將；當時國人很敬佩他，美國人也很支持他。抗戰時期，他常坐我們的飛機從歸綏到重慶。當時我們對他相當崇敬，而他謙沖誠懇，雖帶三分土氣，但頗有大將風範。他每到重慶，除周至柔將軍外，我很少看到國府大員去接他。他對空軍似乎很有好感，譬如張鳳瑞同學，每次回綏遠省親，傅作義總是派專車（火車）去迎接。派到他轄區工作的空軍人員，也都受他禮遇接待，特別是我空運大隊的人員。

1948年底，林彪和羅榮桓指揮的東北野戰軍佔領了東北。國軍孤守長春、瀋陽和錦州三城，我數度飛蔣總統前往瀋陽和北平，親自坐鎮指揮。其時傅作義擔任華北剿匪總司令，那時的他，仍然給人信心十足的感覺。

後來戰況急轉直下，1948年11月8日，徐蚌大戰發生，這是政府軍和共軍最大規模的戰役，也是決定戰局前途的一次大會戰。

另一方面，攻佔了東北的共軍，在林彪指揮下，折回華北，南下進逼平津；與聶榮臻、賀龍等部匯合，兵力近百萬，逐漸對平津形成包圍。

當時傅作義手中擁有六十萬大軍，維持在平、津、保、唐、張家口等幾個孤立據點。蔣總統命他一定要力守，於是親筆寫了手諭，派蔣緯國送去，並由我駕機送他去北平。

我們降落在北平東交民巷的大操場上，立即去司令部了解戰況。當時的傅作義好像失去了原來自信滿滿的神采，顯得有些焦慮而猶豫。

司令部牆上掛滿作戰地圖。晚飯後，他一直在地圖前面來回踱步，口中唸唸有詞：「來得太多了！來得太多了！」意指林彪部隊的南下，神色十分憂慮不安，完全不像我過去所見到的傅將軍。

他同時不停地詢問幕僚：「徐州那邊打得怎麼樣了？徐州那邊打得怎麼樣？」一代名將惶惶若此，我看眼中，心裡已經有數，未戰已先喪其氣，平津想必保不住了。

面對這場攸關國共勝負的戰事，預知即將失敗的噩運，卻只能在一旁束手無策，心中十分難過。其實，據我所知，當時傅軍有三師兵力在天津一帶，如能固守塘沽，由側方威脅，則共軍不敢貿然進攻北京。屆時傅軍可較從容地由北平一帶轉移到張家口、綏遠，固守傅軍「老家」，再從長計議。但傅不作此舉，非不知此理，據悉當時美國決定直接軍援傅部，把大部軍品運往北平儲存；但因共軍來勢兇猛，無法將那些大量補給往西北轉運。如沒有那些後勤補給，則傅部戰力必大受影響，結果會敗得更慘。在此情況下，傅的心情不問可知。

事後有人評論：諉過傅作義，謂其投降可恥。以我淺見，有失公道。傅作義未堅守北平應是一敗筆，但以整體國共戰爭而論，國軍之失敗，應該輪不到由傅作義

負責！

以我和我隊員在各戰場上空目睹，傅部還算打過幾個勝仗，如張家口之役。不像一些所謂嫡系部隊，雖有強勢兵力，但每遇共軍即被包圍；由我空運部隊空投補給，結果還是被共軍吃掉。如永年、長春、徐蚌、雙堆集，以及爾後的重慶、成都、西昌、海南島等地的所謂保衛戰，其戰果都比傅部好嗎？相信研究國共戰史的專家，應有公評。

1月11日國軍在徐州大敗，1月15日天津陷落。據聞北平市長何思源及西北軍的鄧寶珊都勸傅作義放棄抵抗，否則北平文物和人民損失太大。1月23日，傅作義終於向共軍「言和」（現任北京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何魯麗，正是當年何市長的女兒）。

北平失陷後，蔣總統正在重慶「坐鎮」。他派徐永昌去包頭，那時重慶與包頭間一帶地區完全由共軍佔領。其間因無導航設備，我空運機飛過一趟，未能完成任務。蔣先生就指派我去，我安全地把徐永昌送到包頭，在那裡遇到了傅作義的親信馬副官。我問他：「為何讓共軍直接開進北平呢？」馬副官說傅作義也覺得十分愧對國人，在共軍開進北平時，他不斷的自已掌嘴擱臉，懊惱不已。但歷史的洪流走到這一步，非任何人可以挽回。

傅作義固然深為自責，而所有我們這輩軍人，能不同負敗績的責任，而深感痛心麼？

徐永昌送去「固守綏遠，逐漸向西北轉移」的命令，似已落空。看來傅、徐也未多談；倒是接連三晚，傅作義都到我的住處聊天。他說中央大概不知道共軍已攻佔甘肅武威，完全截斷了撤往西北的通路。同時我也看見包頭城外停了一長列火車，據說是為送傅作義用的，裡面也有相當數目的共軍「保護」傅將軍。當時在包頭一帶，駐有三個師，聽說三個師長都是陸軍官校畢業。某晚我應邀參加他們的聚餐，看到那幾位師長和一些高級軍官悲酒激昂，他們的心情可想而知。在包頭停了三天，又循原航線，懷著沉重的心情，飛回重慶。後來報載傅被任命為北京共黨政府的水利部長。其晚年如何，則不得而知了。

第6節 外交才子葉公超

當年外交部有一位「大才子」、一位「小才子」，小才子的姓名我已忘記，而大才子即葉公超部長是也。他不但才華洋溢、風度瀟灑；而更值得佩服的是他的君子風骨、坦誠厚道。

我第一次認識他是在1950年，那時我在嘉義當大隊長。有一天，家兄復得陪著他到來，還有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和美經援在台負責人亨特（Henry Hunter）。後者是農業專家，1930年間曾在北平潞河中學教書；他太太教英文，我還上過她的課。這些人是到嘉義紅毛壁去打獵的，出發前都到我家休息。在打獵之餘（計獲獐子一

隻），還到附近的農村去看水利灌溉情形。我當時對葉的印象是平實、健談、英文極棒。

次年又承邀同原班人馬去台東打獵，雖一無斬獲，但充分欣賞了東部的景色。

1956年，他那時是外交部長，我因奉命去法國參加國際航空大展，有些事要請教他。他除了介紹歐洲的概況，並且通知我所要經過地方的我國大使館，使我沿途都受到照顧，對此至今我仍心存感激。特別是他誠懇和藹及毫無官架子的態度，給我印象深刻。

1954年，我時任駐華盛頓空軍武官，他代表政府去華府與美方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事後他給了我一份「條約」的副本。在那些日子裡，我對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他對世局的了解，及對台灣的處境，均有獨特的看法；雖不見得與一般人相同，但我個人則甚有同感。後來他從駐美大使位上「跌下」，就在台北過著悠閒生活。由於他與家兄復得熟稔，我也就有機會時相交往；也曾去他天母的家吃飯，看他的畫室，有時他也到我家便餐。他談吐很風趣，在蔣經國當政後，有時也詢問他一些事，他都直言無諱。有一次提到張大千，葉說他是「老怪」。說起當時的行政院長，他稱之謂「傻瓜」（只是對我們講）。那時很多政府高官，以穿中山裝為時髦，蔣經國也叫他去做一套，他卻說為什麼大家都穿起列寧裝來？

在黃少谷的公子任中由美返台時，葉告訴任中：

「回台灣很好，但是一定要做官，免受人欺。」這些都是小事。葉部長去世多年，但每回想到他的瀟灑英姿與豐富學養，開闊的胸襟，處事的明斷，竟在晚年志不得伸，甚為國家可惜；也想到古人所言：國家非無賢士，能否被重用而已。今在外交圈中已不多見如葉氏之人才矣。

第7節 傲氣蘊涵孫立人

孫立人將軍是北京清華大學畢業，比家兄復得早兩年，後進入美國維吉尼亞軍校（VMI）專攻軍事。畢業後回國，受知於宋子文，派任為財政部轄屬的稅警團團長。抗戰爆發後，該團參加作戰，在抗戰後期改組為第卅八師，旋又擴編為新一軍，與廖耀湘的新六軍同赴印度整訓。孫將軍的名聲，就全國皆知了。

我初識他也是在那時候。因他在印度時，邀請復得以「同上校」官銜，委任為他的私人秘書。所以我從家兄那裡，以及美軍派駐「中印緬戰區」的砲兵指揮官拉瓦上校（Col. Lavael）處，更進一步認識了孫將軍。拉瓦在戰區是受孫的節制，與孫將軍接觸很多；戰後娶了一位上海小姐，在華府退休，過著悠閒的生活。當時我正任職駐美空軍武官，因此相熟。

拉氏對孫立人極為欽敬，認為很少中國將領能受美軍尊敬如孫將軍者。舉一個小小的事例：美軍軍官要見

孫將軍時，必須遵從中國國軍的禮節，在門外高喊「報告」，准許後才得進入晉見。又如美國派駐中印緬戰區的最高指揮官史迪威將軍（Joe Stiwell），對我高級軍官的評語，多數是很差的；惟有對孫立人將軍，卻誇讚有加。抗戰勝利後，孫將軍且榮獲艾森豪將軍邀請，訪問歐洲戰場。足見他在盟軍心目中的地位。

不過，我真正和他接觸，還是在政府撤到台灣以後。那時他在鳳山訓練新軍，而空軍第十大隊方遷嘉義。為了嘉義市東門町眷舍，希望能給剛遷來的第四大隊眷屬居住，我以基地指揮官的身分去見孫將軍，請求他把那批眷舍撥交空軍，承他立即慨允，幾天後就全部空出。第四大隊的眷屬也就有屋可住，解決了我們的一大難題。

他時常乘坐直升機到嘉義一帶來視察陸軍，我因此也時與見面。他在天熱時候，常戴一頂竹製斗笠，輕裝簡從到部隊去視察。他對士兵毫無官架，且和他們席地而坐，一塊兒吃大鍋飯；其與部屬同甘共苦的作風，實在令人敬佩。與有些高階長官昂然闊步、趾高氣揚的驕縱，不能相比。走筆至此，惟有長嘆而已！他對嘉義空軍基地環境的整潔，以及官兵禮節之周到，也常表讚許。我身為基地一分子，頗引以為慰！

後來台海局勢漸穩，當局可能也為了拉攏中美兩國的軍事關係，孫將軍被調升為陸軍總司令。那時我也調空軍總部任職，見面機會便較多了。當年蔣公總裁決心

要從改造國民黨著手，經營台灣為復興基地，所以重用了一些年紀較輕而勇於任事的人，如周至柔、葉公超、孫立人、吳國楨等。我有時去國防部，也經常見到葉、周、孫等正在熱烈討論國是；也見過他們把應興應革的政見，連署簽呈總裁。足徵其時政府的改革決心，和高級幹部的團結合作，相忍為國，真的很有一番中興氣象，予國人極大的鼓舞。

1954年《中美協防條約》簽訂以後，不知何故，那股改革的勁道，竟然漸漸鬆弛下來。黨內和軍中又開始搞派系，以致發展到吳國楨的出走，以及孫（立人）案的突發。我對內情，無資格也不願意去深入了解。但若說孫立人「蓄意叛國」（蔣經國曾親口對我如此說過），實在難以置信。後來孫不但去職，而且被軟禁多年，不禁令人扼腕！

基於道義，復得常常不避嫌疑地到台中去看他。我也曾探望過他一次。1986年他恢復自由，1990年逝世時，我還特地去他家致悼，並和孫夫人等家人談了很久，以表達我對孫大哥懷念之情。

提起「孫大哥」，這是他在世時我對他的稱呼；也是因為他是復得的學長，確應尊稱他一聲「大哥」！

在他陸軍總司令任內，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是他首創「早餐會談」，就是對來訪的外國要員，以早餐招待，藉此交換意見，並節約彼此的時間，同時也免去老套的官式應酬。

另外一事，是他對國軍高官那種不卑不亢的態度。記得是1950年，我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時，同期的包括劉安祺、高魁元等陸軍老前輩。在閒談中有些人對孫深表不滿。有人說：「我們晉謁總統時，他老先生都會起身還禮，可是去見孫總司令時，他卻坐在椅子上點點頭而已。」有次我在孫府作客，因為沒有外人，就將此事說給他聽。他以輕蔑的口吻，批評一般陸軍將領之無能，僅憑關係當官。他半開玩笑地說：「大家都是委員長的學生，who怕who？」的確，孫是有一點傲氣，但卻有幾分正氣。不然的話，他應該更被重用，起碼不致於被「整」。寫到這裡，我不禁慨嘆：何謂公平？又何謂正義？

第8節 飽學謙沖俞大維

俞先生是1952年至55年，我在華府任武官時認識的。我不知道他的官銜是什麼，但他的辦公室設在我駐美軍事物資採購處內。那時該處的負責人，是一位陸軍的韓將軍。但我印象中，與軍購有關的重要事項，應該都是俞先生主導。有時候我和海軍武官柳鶴圖上校，也伴隨他去五角大廈（美國國防部），與美軍談有關中美軍事的問題。

俞先生的英文造詣很深，但他常以開玩笑的口氣說：他的德文比英文好，英文比中文好。當然我無資格對此有所評斷，但以他留學美、德的學歷來看，德文和

英文的標準均應稱上乘。那時我們的大使是顧維鈞博士。兩位學養均深，頗為外人所尊敬，我等身為館員，與有榮焉。

在華盛頓，俞先生住在一處我政府的房子裡，那是毛邦初將軍所購買的，環境幽靜，與當時美國務卿杜勒斯的家為鄰。俞家除俞夫人外，尚有三子及長媳同住，我和瑛華也是俞家常客。在我任滿返國前，提早把我家住宅讓給後任，我奉命去阿拉巴馬州接受噴射機訓練；瑛華及小孩則承邀搬到俞家小住，也常陪俞夫人及寡居的桂永清夫人打打小麻將。等到我回國時，俞先生那時已任國防部長，借住其妹俞大采教授的台大宿舍。有時視察前方，常命我同行。

最值得回憶的是視察大陳島，曾到一江山與官兵晚餐並詢問軍情。一江山並無碼頭，船靠岸非常困難，俞先生腳力又差，經兩人架起才勉強登陸，險象百出。返台後不久，大陳即行撤兵，而一江山則為共軍佔領。

俞先生居家甚為儉樸，除廚師一人外，只有女傭龍嫂照顧起居；龍嫂年老耳又重聽，常聽不到門鈴。我曾建議他，身為國防部長，應可派用警衛一人看門。他的回答很妙：「我現任部長可有侍衛，等我交差，人就撤走，還是不用的好！」好在看他的人雖然多，但多為熟人，茶水自己動手。有時趕到用餐時間，加一份碗筷而已，賓主都無所謂。俞先生可說是位清流，他在家的時間多半看書。他的令弟大綱是位戲劇學者。毛子水、曾

約農兄妹均是俞家常客，但都不相互應酬，也少交談，坐坐就走；相交如水，但都具有學者風範。

俞先生後與蔣經國結為親家，但非兩老所願。俞先生常說，他雖被老蔣總統所倚重，但他（俞自稱）從未被認為是蔣氏「心腹」；很多重要的事，「我都不知道」。在蔣經國被任為國防部副部長之後不久，俞先生很「知趣」地辭去部長以「讓賢」。後被聘為總統府資政。每日以讀書自娛，並逐漸把藏書捐給台灣大學。這位博覽群書的部長於1992年6月辭世，長子揚和奉遺囑將先生骨灰撒於台灣海峽（未發訃聞），無聲無息地離開了塵世。



1997年與漢卿（張學良）夫婦在夏威夷共度春節。
後排左起：王智平夫婦、本人、汪積成、徐君毅夫婦。
前排左起：瑛華、漢卿夫婦、汪太太周愛梅。



1950年嘉義打獵。

後排右起：本人、美援會亨特先生、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先生、
葉公超大使、衣復得。

前排右起：孫以晨及嚮導二人。



周至柔將軍（右二）當年推廣高爾夫球運動不遺餘力。與呂良煥（右一）、謝敏男在臺北縣老淡水球場合影。



1956年長虹盃高爾夫球隊之隊友在台北球場合照。當時瑛華為第一任隊長。蔣經國（最中間著直條紋襯衫者）為榮譽隊長。方良與馬賓農（前臥者）為非空軍隊員。



1992年在上海舉辦第一屆長江盃邀請賽。與中國高球協會主席、奧運主委榮高棠先生（左四，也是當年乒乓外交的推手）合影。

前排右起：呂良煥、沈家麟（上海清浦球場董事長）、本人、瑛華、榮高棠、鄭拓彬（北京外經貿部長）、黃夫人。

中排右起：榮總徐弘主任（其後左為體育記者王麗珠，後右為郭吉雄）、謝敏男、曾俊義夫婦，其後中立者為汪積成先生。